

工作與學習叢刊



上海書店

胡
风等编

工作与学习丛刊

上海書店

《工作与学习丛刊》始末

胡风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先生逝世了。在文化阶层和先进人民中间涌起的哀悼热潮震动了整个社会。鲁迅精神的伟大力量超过了任何人的预计。

当时党中央派回上海恢复领导工作的冯雪峰，起意要我在他的安排下编一个刊物，和鲁迅的老朋友以及他晚年接近的青年作者取得联系，在思想上和创作上学习并发扬鲁迅的精神。

登记出杂志一定得不到国民党的批准，只能用出丛刊的形式，取名《工作与学习丛刊》。也只能由有党的关系的生活书店出版，但这不取得茅盾的支持就不能做到，因而茅盾被列为这个刊物的基本作者之一，挂了个编辑名义。

当时，我的理解是，鲁迅精神是全民族、全体劳动人民的精神财富，继承并发扬鲁迅精神只能放在劳动人民的斗争实践上面，也就是，把希望放在和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结合着，能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真实和斗争意志的作者，尤其是

成长中的青年作者身上。现在，把目光放在少数人身上，这是不能适应历史实际的发展动向的。

冯雪峰是领导人，我只能服从。他要我和生活书店的徐伯昕联系出版事。

第一本《二三事》，一九三七年三月出版。从鲁迅的遗文《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取名的。当是适应了读者的要求的，尤其因为有鲁迅的遗作。

第二本《原野》，四月出版。是用艾青译的凡尔哈仑的自由诗命名的，出版后不久就被国民党禁止了。但禁止后几天又收到了原禁止机关的公文，说阅报知道有《原野》出版，不知道内容反动与否，着即缴呈若干本，云。不知道内容反动与否就禁止了，或者，禁止了还不知道内容反动与否，这是极其恶劣的文化反动政策的例证。我在当时的《读书》杂志上写了一则《反「沙漠化」的愿望》，指斥了国民党政府的这种反动荒谬的政策。

第三本《收获》，五月出版，是用力群的一幅木刻命名的。

第四本《街景》，是用美共刊物《新群众》上的一幅石版画命名的。但排成后就得到书店的通知，说前三本都被禁止了。这一本虽已排成，不能出了，只好拆版，云。直到四十多年后的去年，看到上海的复印本，这才知道，这一本还是出了，不

过改名为《黎明》(艾青的一首诗名),因而,当时我和有关的作者都没有注意到。

这个刊物就这样结束了。原因是被禁止。

关于作者,鲁迅老朋友许寿裳、李霖野等的,都是雪峰约来的。其中如苦力的《鲁迅的美术活动》就是粗略的,发表了它是希望引起补充和讨论。

新的作者的稿子,都是由我约来的或投寄来的。艾青是精力充沛的,吸引了读者的一个。我记得有《龙华的桃花开了》,沉痛地哀悼了在龙华牺牲的烈士们,大概是收在第三本《收获》一组中的。可以说,艾青是在这个刊物中开始吸引了读者的。

端木蕻良也是在这个刊物上与较广的读者相见的。

其他象曹白和贾植芳,都是第一次出现的名字。他们都是业余作者,但是,就是到了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他们业余的所作,也还是对读者保持着生命力的。只有孔嘉一篇,我记不起内容和这个作者的任何情况,很可能是冯雪峰拿来的。

也曾想在杂文和书评上用点力。杂文虽然有了一些,但和鲁迅那种针针见血的深刻性还是相差太远了。书评也有些,能够碰一碰当时国民党所师事的希特勒,也只好聊以自慰了。

我提了一下思想活动的民主性问题。当时，权威地位的教授提出了思想活动的「危机」问题，以为青年们「误认信仰为思想以及误认旁人的意见为自己的思想」，造成了一种「恶风气」，因而要求「自由讨论与自由研究」。但他们却把这种「恶风气」归到唯物主义运动的身上，对主要原因的国民党政府的压迫思想活动，不准「自由讨论与自由研究」的反动文化统治政策反而只字不提，这就暴露了他们和国民党是互相呼应的。在统一战线原则上，不能不向教授提出，应该和代表人民先进要求的唯物主义思想运动阵营联合起来，认真地向国民党政府争取「自由讨论与自由研究」的民主的文化运动的实现。

还发表了冬青的《关于〈思想方法论〉》。这是对艾思奇的《思想方法论》中某几个原则性的观点提出了意见。作者是一个中学生，但他却从生活实践中的诚实的受力和斗争要求出发，对唯物主义思想工作提出了敏锐的看法。看法可能不完全正确，但那种从生活实践出发的诚实性和敏锐性，却是足以发人深省的。这才是为了打破思想活动的沉滞危机而作出的真诚的努力；和教授们对唯物主义思想活动的伪善的斥责不同，他是出自对唯物主义思想活动的真诚的爱护而提出的自我批判。思想活动只有在真诚的自我批判中才能够和反动的压迫进行抵抗而前进。

我在后记中提到，一个中学生的青年，对哲学问题能够这样尖锐地提出意见，可见我们的思想运动是大有可为的；被批判者也一定会高兴。但意外地引起了相反的反应：一个中学生敢于批判大作家，这不是对被批判者的一种污辱么！这以后，我再没见过这位作者的文章了。

在见到的材料中，介绍了点外国革命作品。

介绍了些外国木刻和创作木刻。日本木刻家为中国古代寓言刻的木刻，是具有独创的风格，我喜爱它们，但好象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在这四本书的最后，我用「记者」、「校读生」、「X·F」的署名都写了校读后记。

關於太炎先生的

二三事（遺著）

魯迅

前一些時，上海的官紳爲太炎先生開追悼會，赴會者不滿百人，遂在寂寞中閉幕，於是有人慨歎，以爲青年們對於本國的學者，竟不如對於外國的高爾基的熱誠。這慨歎其實是不得當的。官紳集會，一向爲小民所不敢到；況且高爾基是戰鬪的作家，太炎先生雖先前也以革命家現身，後來却退居於寧靜的學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別人所幫造的牆，和時代隔絕了。紀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許將爲大多數所忘却。

我以爲先生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史上還要大。回憶三十餘年之前，木板的虛書已經出版了，我讀不斷，當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時的青年，這樣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國有太炎先生，並非因爲他的經學和小學，是爲了他駁斥康有爲和作鄒容的『革命軍』序，竟被監禁於上海的西牢。那時留學日本的浙籍學生，正辦雜誌『浙江潮』，其中即載有先生獄中所作詩，却

並不難懂。這使我感動，也至今並沒有忘記，現在抄兩首在下面——

獄中贈鄒容

鄒容吾小弟，被髮下瀛洲。快剪刀除辮，乾牛肉作餚。英雄一入獄，天地亦悲秋。臨命須摻手，乾坤祇兩頭。

獄中聞沈禹希見殺

不見沈生久，江湖知隱淪。蕭蕭悲壯士，今在易京門。鱗鬣羞爭餞，文章總斷魂。中陰嘗待我，南北幾新墳。

一九〇六年六月出獄，即日東渡，到了東京，不久就主持『民報』。我愛看這『民報』，但並非爲了先生的文筆古奧，索解爲難，或說佛法，談『俱分進化』，是爲了他和主張保皇的梁啟超鬭爭，和『×××××』的×××鬭爭，和『以『紅樓夢』爲成佛之要道』的×××門爭，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

前去聽講也在這時候，但又並非因為他是學者，却爲了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現在，先生的音容笑貌，還在目前，而所講的『說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記得了。

民國元年革命後，先生的所志已達，該可以大有作爲了，然而還是不得志。這也是和高爾基的生受崇敬，死備哀榮，截然兩樣的。我以為兩人遭遇的所以不同，其原因乃在高爾基先前的理想，後來都成爲事實，他的一身，就是大衆的一體，喜怒哀樂，無不相通；而先生則排滿之志雖伸，但視爲最緊要的『第一是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見『民報』第六本），却僅止於高妙的幻想；不久而袁世凱又攔奪國柄，以遂私圖，就更使先生失却實地，僅垂空文，至於今，惟我們的『中華民國』之稱，尙係發源於先生的『中華民國解』（最先亦見『民報』），爲

鉅大的紀念而已，然而知道這一宗公案者，恐怕也已經不多了。既離民衆，漸入頹唐，後來的參與投壺，接收餽贈，遂每爲論者所不滿，但這也不過白圭之玷，無非晚節不終。考其生平，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並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範。近有文僧，勾結小報，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鳴得意，真可謂「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而且「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了！

但革命之後，先生亦漸爲昭示後世計，自藏其錄銓。浙江所刻的「章氏叢書」，是出於手定的，大約以爲駁難攻訐，至於忿冒，有遠古之儒風，足以貽譏多士的罷，先前的見於期刊的鬭爭的文章，竟多被刊落，上文所引的詩兩首，亦不見於「詩錄」中。一九三三年刻「章氏叢書續編」於北平，所收不

多，而更純謹，且不取舊作，當然也無鬭爭之作，先生遂身衣學術的華袞，粹然成爲儒宗，執贇願爲弟子者綦衆，至於倉皇製『同門錄』成冊。近閱日報，有保護版權的廣告，有三續叢書的記事，可見又將有遺著出版了，但補入先前戰鬭的文章與否，却無從知道。戰鬭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業績，假使未備，我以爲是應該一一輯錄，校印，使先生和後生相印，活在戰鬭者的心中的。然而此時此際，恐怕也未必能如所望罷，嗚呼！

（十月九日。）

魯迅的生活

——在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

魯迅座談會 講

沈蕓芳 記錄

許壽裳

前兩天，王同學來說，定於今天下午三時半在本院開魯迅座談會，要我講點關於魯迅先生的生活情形，我便忻然的答應了，所以我今天所講的題目是關於他的生活。魯迅是預言家，是詩人，是戰士。我在懷亡友魯迅文中說過：「他的五十六年全生活是一篇天地間的至文」，也就是一篇我們中華民族的傑作。這樣偉大的一生決不是短時間所能說盡的，不過隨便談談，得個大概罷了。

在開講之前，我要問諸位一聲，諸位大概在中學時代，甚而至於在小學時代已經讀過了魯迅的作品。讀了之後，在沒有會見他或者沒有見過他的照相之前，那時諸位的想象中，魯迅是怎樣一個人？這種回憶，對於魯迅的認識上是很有幫助的。我的一位朋友的女兒，十餘年前，在孔德學校小學班已經讀了魯迅的作品。有一天，聽說魯迅來訪她的父親了，她便高興之極，跳躍出去看，

只覺得他的帽子邊上似乎有花紋，很特別。等到掛上帽架，她仰着頭仔細一望，原來不過是破裂的痕跡。後來，她對父親說：「周老伯的樣子很奇怪。我當初想他一定是着西裝，皮鞋，頭髮分得很光亮的。他的文章是這樣漂亮，他的服裝爲什麼這樣不講究呢？」

再講一個近時的故事：這見於日本內山完造的魯迅先生文中，用對話體記着有一天，魯迅照常穿着粗樸的藍布長衫，廉價的橡皮底的中國跑鞋，到大馬路 Cathay Hotel 去看一個英國人。

「可是，據說房間在七層樓，我就馬上去搭電梯。那曉得司機的裝着不穩會的臉孔，我以爲也許有誰要來罷，就這麼等着。可是誰也沒有來，於是我就催促他說『到七層樓，』一催，那司機的傢伙便重新把我的神氣從頭頂到腳尖骨溜骨溜地再打量一道，於是乎說『走出去！』終於被趕出了電梯。」

「那才怪呢！後來先生怎樣呢？」

「沒有辦法，我便上扶梯到七層樓；於是乎碰見了目的的人，談了兩小時光景的話，回來的時候，那英國人送我到電梯上。恰巧，停下來的正是剛才的那一部電梯。英國人非常殷勤，所以這次沒有趕出我，不，不是的，那個司機非常窘呢。——哈哈……」（譯文二卷三期，日本原文見改造十八卷十二號）

關於魯迅容貌的印象：我在此引一個英國人的話，頗覺簡而得要，這見於 H. E. Shadick 的對魯迅的景仰文中。他是燕大英文系主任教授，不會會見過魯迅，只是從照相上觀察，說道：

「在我的面前呈現着一張臉，從聳立的頭髮到他的有力的顎骨，無處不洋溢出堅決和剛毅。一種坦然之貌，惟有是完美的誠懇的人纔具備的。前額之